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徐崇温 主编

(匈) 乔治·卢卡奇 著

张西平 译

历史和阶级意识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

YANJIUCONGSHU



重庆出版社

DF69/13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 重庆出版社

历史和阶级意识

马恩思主义辩证法研究



YANJIUCONGSHU

YANJIUCONGSHU

YANJIUCONGSHU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根据美国麻省工学院出版社 1971 年英译本译出

责任编辑 黄长军

封面设计 王晓珊

技术设计 刘忠凤

[匈]乔治·卢卡奇著 张西平译

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5 插页 4 字数 322 千

1989 年 1 月第一版 1989 年 1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200

*

ISBN 7-5366-0892-6/B·22

定价：4.75 元

15/10/13

在研究当代各种思潮中 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的出版而作

徐崇温

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学说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建设到改革的发展，“都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扩展和深化，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结合”；指出“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

要适应这样的大趋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就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就是说，必须在积极探索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中的新问题，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的同时，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研究当代各种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

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还要研究当代各种思潮？

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过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赢得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就是

因为它是在吸取和改造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中形成起来的；在今天，在世界发生着巨大变化，人类对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的思维本身的认识日益深化，并且在新的探索中，提出种种新的学说、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观念的时候，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吸取和改造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就显然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即使是资产阶级思潮，尽管它们大多以现代唯心主义的歪曲形式出现，却毕竟在这种形式下，提出了一系列真正由实践产生的问题，一些实际的、迫切的科学问题。把这些问题当作正面考察的对象，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从中引出应有的结论，可以使马克思主义紧紧把握时代和实践的脉搏，从新的实践中吸取思想营养。

在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现时代，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尤其具有迫切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新的技术革命使得全球问题日益尖锐化，把人类生存的利益提到极其突出的地位，要求人们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以正确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十分明显，必须深入研究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当代各种思潮，我们才能跟上时代和实践的足迹，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

而在当代各种思潮的研究中，对于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考察，对于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宏伟事业来说，又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是因为这些思潮、流派都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二是因为它们又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之下，以不同的哲学世界观为指导去进行这种研究的，课题的同性和观点的多样性相统一，这就使这种考察可以更加直接地有助于我们在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并结合亿万人民

的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以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为例,长时期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一直进行着热烈的讨论;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只按自己的规律运转、而同人的实践没有干系的体系,认为马克思在哲学领域中实现的革命变革是把实践引进了认识论,把人对客观世界的改变,看成是认识的基础;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则认为,世界是通过主体而得到中介的,因而,在马克思那里,不是物质的抽象,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性,才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对象和基础。

在这些不同思潮的撞击中去研究和把握马克思著作的精神,我们便不难发现: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具有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是把实践引进了本体论,强调也要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事物,即把事物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强调人类连续不断的感性活动,是现存感性世界的深刻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始终坚持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始终坚持劳动实践在多种层次上所受的自然制约性。

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联结、不可分割的。然而,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强调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即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却忽略了它的第一个基本点,即从主观方面把事物当作实践去理解,这就很难同旧唯物主义完全划清界限,这种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其量只是一种片面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之,“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虽然突出了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第一个基本点,却又忽略乃至否定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所以,尽管它们再三声称要纠正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缺陷,但在实际上,却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一个和苏联模式方向相反的歪曲,这样那样地陷入了唯心主义。

所以,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

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派的哲学，它们都没有从上述两个基本点的联结上去把握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附加成分，我们必须从中引出应有的经验教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恢复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本来面貌，并且根据当代人类的实践去理解其深刻含意，把它推向前进。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就是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在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编辑出版的。

就这套丛书的覆盖面来说，它既包括东方的，又包括西方的，但鉴于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西方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了解得较少，所以，在选材方面将以西方的研究为主。邓小平同志说过：“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要求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道、不合理现象直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154页）

就这套丛书的品种来说，既有对国外学者原著的翻译，又有我国学者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研究和评述。但长期以来，我国读者接触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的原始材料太少，因此，这套丛书将以翻译国外原著为主，随着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广泛展开和逐步深入，而逐渐增加我国学者研究专著的比重。

这套丛书的编选，力求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将根据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挑选一定的翻译和写作书目，组织合适的译者和作者去完成以后分期分批出版。另一方面，我们又竭诚欢迎大家向我们推荐有关的书目、选题，包括推荐译者和作者，还竭诚欢迎大家对丛书中已经出版的作品提出批评和意见。

希望通过这些办法，把这套丛书真正办成一套比较能够反映我国广大读者的需要和要求，在全党全国建设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在实践中学习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任务中，发挥一点促进作用的丛书。

什么是正统的 马克思主义？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这个问题已经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集团所反复讨论的焦点。但是在一些知识分子中，对任何赞成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声明都给以冷言冷语的蔑视，这已逐渐成了一种风尚。甚至在社会主义的阵营中，对关于什么构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的哪些论点可以“允许”批评甚至抛弃，而不丧失掉“马克思主义者”称号的权利这些问题都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结果，那种用类似于对圣经进行训诂的学究式来注释经典著作，而不是鼓励一种对“事实”做“公正研究”的方法，就越来越被认为是“不科学的”。这些经典著作，已被证明被现代的文明所超越，并且它们将不再被认为是真理的唯一源泉。

如果问题真以这种拙劣的、对立的术语阐述出来，那真是不屑一顾。但事实上，这些认识并不是（并且从来不是）完全这样直截了当地提出来的。让我们姑且假定，最近的研究已经一劳永逸地证明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命题都是错误的，即使这样，每一个严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将仍然可以毫不保留地接受所有这些现代结论，并由此不考虑马克思的任何一个单个的命题——然而，却一刻也未逼迫他们放弃其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所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不加批判的接受马克思的一些研究成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命题的“信奉”也不是对“圣书”的解释。与此相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指的只是方法。它科学地坚信，辩证唯物主义是通向真理的道路，只要沿着其奠基人所开创的路线前进，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能得到发展、扩大和加深。此外，它还坚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超越和“改良”的企图已经而且必将造成简单化、浅薄和折衷主义。

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这个定义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对于理解唯物辩证法的本质来说，还完全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要按正确的方法探讨这个问题，那么在我们讨论辩证法本身之前，就必须完全掌握这一定义。这个问题与理论和实践的问题有关。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不仅仅是马克思第一次批判黑格尔时所赋予的那种含义，“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①此外，还需要从理论和掌握群众的方法这两个方面发现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页。

的特征和定义，正是它的这种特征和定义才把理论（辩证法）转变成了一个革命的手段。我们必须从方法以及它与对象的关系中，抽象出理论的实际本质来。如果不是这样做，“掌握群众”将变成一句空话。群众就会被完全不同的势力所控制，从而去寻求完全不同的目标。如果那样，理论和群众的活动之间就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它会使群众能够意识到社会必然的或偶然的行动的一种形式，而并不保证群众的意识和他们的行动之间有一个真正的和必然的联系。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清楚地规定了理论和实践两者之间成为可能的条件。马克思说：“光是思想竭力体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①或者，像他在较早的一篇文章中所表述的，“那时就可以看出，世界早就在幻想一种一旦认识便能真正掌握的东西了。”^②只有当意识和实在处在这样一种关系时，理论和实践才能被统一起来。只有当意识的出现必然成为历史的过程朝着它自己的目的所必须迈出的决定性的步骤时，理论才有可能与实践相统一（历史过程的目的是由人的意志所构成的，但它既不依赖于人的幻想，也不是人所虚构的产物）。理论的历史性的功能就是使这个步骤成为实际的可能性。只有当出现一个阶级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就必须认识社会这样的历史局面时，只有当一个阶级认识其自身就意味着认识整个社会，结果这个阶级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认识的客体时，简而言之，只有当这些条件都被满足时，理论和实践才将能统一，理论的革命功能的前提才成为可能。

事实上，随着无产阶级进入了历史舞台，这种形势就已经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62页。

② 同上书，第418页。

现。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宣告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①断言这种情况的理论和革命之间的联系既不是任意的，也不是神秘莫测或者是容易产生误解的。与此相反，理论本质上是革命过程本身的观念的表述。革命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在理论上都固定下来，这样它才能被概括、交流、利用和发展。因为理论只是确定和表现必要的步骤，这样它同时成为了随意识而出现的实践的必然前提。

为了认清理论的作用，就要理解它自己的基础，即辩证的方法。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辩证法讨论中的许多混乱，都是因忽略了这一点而造成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论述，对后来的理论活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然而，我认为这些论述，无论是我们姑且承认它们的经典的地位，还是批评它们，认为这段论述是不全面的，甚至是有缺陷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任何地方，在恩格斯的论述中都没有探讨过这个至关重要的方面。也就是说，恩格斯采取了与“形而上学”相反的对比方法论述了辩证法概念的构成。他强调在辩证法中概念明确的界线（以及它们所描述的客体）在消失。他论证说，辩证法是以一个定义过渡到另一个定义的过程。结果，片面性和僵硬的因果关系必须为两个概念间的相互作用所取代。但是，恩格斯甚至根本没有提到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的关系这种最重要的相互作用，更不必说给予它本应值得重视的地位了。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因素，辩证法就不再是革命的，尽管试图（归根到底是妄想）保持住“流动的”概念。因为这意味着没有认识到，在一切形而上学中，都没有触及和改变客体。这样，思想就停留在思辨的水平上而没有成为实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66页。也可参见我关于阶级意识的论文。

而对于辩证法来说，中心的问题是要改变现实。

如果忽略了理论这个中心的功能，那么构成“流动的”概念的优点就完全成了问题，它就成了纯粹“科学的”事情。从而，理论就按照它是否符合普遍的科学状况被接受或者被拒绝，而不管人们的基本态度如何，也不管现实能否被改变。正如那些所谓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中间的马赫主义者所证明的，以上那种认识甚至增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在被资产阶级使用的意义上的实在以及它的“对于规律的服从”是不可测知的、宿命的、永恒不变的，思辨的唯物主义和古典经济学就是和这种认识密切相联的。马赫主义也可能产生出一种与此相同的资产阶级的唯意志论来，但这并不矛盾。只是从非辩证的和非历史的观点来看，宿命论和唯意志论才是相互矛盾的。从辩证的历史观来看，宿命论和唯意志论只是两个必然的相互补充的对立面，它是明确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矛盾和在其自己的范围内所形成的不可解决的问题，在人们思想上的反映。

由于这个原因，所有借助于“批评”来深化辩证法的试图都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加肤浅的观点的产生。因为这种“批评”总是以方法和实在、思想和存在之间的分离出发的。而且正是这种分离，被认为是一种值得称赞的进步，因为它把真正的科学的严密性引进了马克思方法的粗陋的、非批判的唯物主义中。当然，并没有人否认“批判”这样做的权利。但是如果这样做，我们必须坚持认为，它必将背离辩证法的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点上的论述是极其明确的。恩格斯说：“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①马克思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7页。重点号是作者加的。

阐述得甚至更明确些，“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范畴表现-存在形式、存在规定……”^①如果辩证法的这一意思被弄得含糊不清，那么辩证法就必定不可避免地开始被看作是一种多余的累赘，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或“经济学”的一种装饰品。甚至更糟，辩证法好像是“严肃的”、“公正的”研究“事实”的障碍，好像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去损害事实的空洞结构。

对辩证法的这种反对，伯恩斯坦表达得最清楚和最有力，在某程度上是由于他“不受”任何哲学认识的明显“偏见”所影响。然而，他从这种愿望出发推演出每个现实的政治和经济的结论，想把方法从黑格尔主义的“辩证法圈套”中解放出来，这些已清楚地表明他这种势力的道路通向何处。它们证明了，如果谁要想建立一种彻底的机会主义理论、一种没有革命的“进化”理论、一种没有任何冲突就可以“自然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那就必须取消辩证法。

二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是这些所谓事实的方法论内涵问题，这些事实被全部修正主义的文献所崇拜。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我们能期望这些事实能为革命的无产阶级的行动提供指导路线呢？毋庸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7页。（重点号由本文作者所加）。认识到这种方法被限定在历史的和社会的范围内，这是特别重要的。恩格斯的辩证法的说明所产生的误解主要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恩格斯错误地追随黑格尔，把这种方法扩大到自然界。然而，辩证法的决定性的因素——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现实中历史的变化处在范畴的下面，作为在思想上变化根源等等——都存在于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中。遗憾的是在这里不可能对这些问题作详尽的分析。

赘言，所有的认识都是从事实出发的。这里唯一的问题是：究竟哪类生活的事实和认识及前后相联的方法相关？

当然，盲目的经验主义者将否认只有在一个体系的框架中（这种体系将随认识的要求而变换），事实才成为事实。他们认为从经济生活中来的每一件事实论据，每一个统计材料，每一个原始资料都已构成了一个重要的事实。然而，在这样做时，他们忘记了不管怎样简单地列举“事实”，无论怎样不加解释，它已经意味一种“解释”。在这一阶段的事实已经被一种理论、一种方法所领会。被从它们原来的生活内容中提取了出来，并固定在一种理论中。

尽管比较世故的机会主义者在本能上深深地不喜欢任何理论，但他们还是欣然地同意了这一点。他们在自然科学的方法中寻求庇护，在这种方法中，科学借助于观察、抽象和实验，提取出“纯粹”的事实并把它们放在相关的内容中。这样，他们用这种理想的认识方式来反对辩证法的强制的结构中。

如果这种方法最初似乎是可能的话，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倾向于产生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促进这种认识的社会结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需要用辩证法去揭露这种社会的假象下的现实。当现实世界的现象被置于（在思想上或在现实中）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它的规律可被观察的环境中时，自然科学的“纯粹”事实就产生了。由于把现象归结为纯粹的数量本质，归结为数 and 数的关系，这个过程被加强了。机会主义者总是不能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本质正是如此来对待现象的。马克思对在劳动过程中的这种“抽象的过程”给予过透彻的说明，^①但他没有忽视同样强调指出，他在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特征。他说：所以，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和具体的发展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4—755页。

所共有，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是只有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

但是在资本主义中，这种倾向有更进一步的发展。经济形式的拜物教特征，所有人的关系的物化，劳动分工的不断扩展只是抽象合理地分析了生产过程而没涉及直接生产者那种作为人所应该具有的潜能，所有这些改变了社会的现象和这些现象被认识的方式。这样，出现了“孤立的事实”，“孤立的”综合事实和分离的、专门的科学（经济学、法学等等）。它们的出现似乎为这样的科学方法的发展大大地开辟了道路。所以探求出事实本身中所含有的倾向，并把这一活动提高到科学的位置，就显得特别“科学”。

相反，辩证法不顾所有这些孤立的和导致孤立的事实以及片面的体系，坚持整体的具体统一。尽管在这种“科学的”环境中这些孤立的事实和体系也揭露了这些现象是一种错觉——尽管这些错觉是资本主义所必然的产物——但这种方法仍给人是一种任意结构的印象。

因而，这种似乎非常科学的方法的不科学性质就在于它没有看到，并去说明作为其依据的事实的历史特性。这是恩格斯已很清楚地提醒我们注意，这种方法并非只有一种错误的根源（经常的被这种方法的实践者所忽视）。这种错误来源的实质是统计和建立在统计基础上的“精确的”经济理论，总是落后于实际的发展。“因此，在研究当前的事件时，往往不得不把这个带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看作是固定的，把有关时期开始存在的经济状况看作是在整个时期内一成不变的，或者只考虑这个状况中那些人以现有的明显事件中产生出来的因而是十分明显的变化。”^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1—592页。“科学的精确性”是以它的成分保持“经久不变”为前提的，这点必须牢记在心。这一点伽利略早就指出来了。

这样我们认识到，把资本主义社会说成预先就和科学方法相符合的，甚至说它构成了科学方法的精确性的社会前提，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如果说相互作用的“事实”的内在结构本质上是历史的，也就是说，如果它们被卷入了连续转变的过程之中，那么我们的确可以质问科学何时出现了这种重大的不精确性。是在我认为事实存在于某种形式中，并且屈从于这些规律的时候（在方法论上我可以肯定，至少有较大的可能，这些规律并不适用于这些事实），还是当我自觉地考虑到这种情况，对由这种方法所达到的“精确性”给以批判的认识，并集中注意了这个历史的方面这个真正表现自身的决定性事实的时候呢？

科学似乎已经掌握住的这样“纯粹性”“事实”的历史的特征，使其以一种更具有破坏性的方式中表现出来。作为历史进化的产物，这些事实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但进一步说，按它们的客观结构，它们还是确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即资本主义的产物。这样，当“科学”坚持认为它们自身直接资料的方式是科学概念的恰如其分的基础时，当它坚持这些资料实际的形式是作为科学概念所阐述的合适出发点的时候，从而它就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简单地武断地采取了自己的立场。它就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作为既定客体的性质和作为“科学”的、不可变的、基础的社会规律。

为了从这些“事实”发展到真正意义上的事实，认识它们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的条件，就十分有必要放弃那种把它们看作直接的既定的观点。它们必须使其自身接受历史的和辩证的考察。如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关系的完成形态，那种表面上，在这种关系的现实存在中，从而在这种关系的承担者和代理人试图说明这种关系时所特有的观念中出现的完成形态，是和这种关系的内在的、本质的、但是隐蔽着的基本内容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概念大不相同的，并